

从“列郡”到“国都”

——唐宋城门营建与改建工程所见城门制度与时人观念

王子奇

[摘要] 城门是城市中的重要构成要素，除军事、建筑功能外还具有较强的“礼仪性”。中国古代都城城门至汉代已确立采用三门道的制度。至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套京城、都城、府州城及其他一般城市彼此不同的城门规制。北宋诸京城门，特别宫城正门的营建与改建也先后受到隋唐洛阳城和长安城的影响，以东京宫城正门为例，北宋初期为下列三门道前出双阙，晚期则改建为下列五门道前出双阙。这也进一步影响到宋代地方城市城门的营建与改建，反映出宋人观念中“列郡”“国都”的城门制度有所区别。

[关键词] 城门；制度；观念

一、引言

中国古代城市中，城门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构成要素。城门与城垣既是划分城内外空间的标志，也是重要的建筑工程与防御设施。同时，城门还与道路、水系等要素相联系，构成了城市格局的骨干系统。

因此，无论是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还是建筑史、城市史等学科的研究，都对城门予以了较多的关注。截至目前，秦汉以降都城城门不少已做过考古发掘^①，在此基础上从上述城市节点或防御设施角度对城门展开的研究以往积累已较多，特别是秦汉以降，目前学界已初步究明了不同时期都城城门形制及作法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一些个案复原研究^②，并进一步对城门址所可能蕴含

作者：王子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zqiwang@ruc.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LSYZD2019）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国古代城门营建制度及其反映的礼制因素”（21XNF022）项目成果。匿名审稿人提供了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当然，文责自负。

① 这方面材料考古发现积累较多，近期的综述材料可参考《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组织刊发的一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的专栏“都城城门遗址考古”，包括刘振东：《汉长安城城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华夏考古》，2018（6）；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载《华夏考古》，2018（6）；龚国强：《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载《华夏考古》，2018（6）；石自社：《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的观察》，载《华夏考古》，2018（6）；汪盈、董新林：《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载《华夏考古》，2018（6）。都城以外的地方城市中可以扬州城为代表，参见汪勃：《扬州城的城门考古》，载《大众考古》，2015（11）。

② 都城门址复原开展较早且比较经典的复原研究可以傅熹年基于考古遗址、文献记载、图像资料等不同类别材料对唐长安城、北宋东京、金中都、元大都等门址展开的研究为代表。参见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载《考古学报》，1977（2）；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载《考古》，1977（6）；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载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51-56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载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282-313页，文物出版社，1998；傅熹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载《考古学报》，1993（1）。

的等级制度及其动因展开了初步探索。^①

上述研究提示我们，城门作为“线性要素”上的一个“节点”与城市生活或军事防御相联系，集中反映出城门的具有实际用途的“非礼仪性”方面。但不容忽视的是，城门还具有“礼仪性”的特殊意义。本文拟沿着这一思路，重点对唐宋时期城门的营建与改建进行考察，希望可以揭示出这一时期都城城门规制中所蕴含的礼仪性特点。

二、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都城城门

通过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在汉代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城门营建的制度，如徐龙国即根据考古发现指出，西汉长安城共十二座城门，每面三座，每座城门都有三个门道，徐龙国称之为“一门三道”。东汉洛阳城共十二座城门，考古勘察已经发现的八座城门也均为一门三道。但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郡国及一般县邑城址，城门无一为一门三道。^②这说明在都城的营建中，已注意在城门门道做法上和一般城市相区别。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三门道的做法被延续下来。如考古工作较为充分的北魏洛阳城，勘探的北魏内城北垣大夏门遗迹保存较好，可以明确有三个门道，已发掘内城东垣最北侧门址建春门、内城西垣中部门址西阳门，也都是过梁式的三门道门址，有学者进一步结合文献^③推测北魏外郭城城门也可能是三门道的门址。这一时期，除都城内城城门外也发掘了宫城城门，与都城内城城门不同的是，已发掘的北魏洛阳宫城南侧正门阊阖门和宫城西墙上的神虎门，都是前出双阙的大型殿堂式门址，其中也辟三门道，阊阖门北侧的二号门址、三号门址，则为不出双阙、形制与阊阖门遗址相似的大型门址。^④这几处门址的发掘，反映出宫城城门尽管建筑形制与内城城门有所不同，但在门道设置上与内城城门有共通性。东魏北齐邺城是北朝晚期考古工作较多，形制清楚的一处都城遗址。邺南城正门朱明门遗址做过全面的考古发掘，也是一处前出双阙的三门道的过梁式城门址（图1）。^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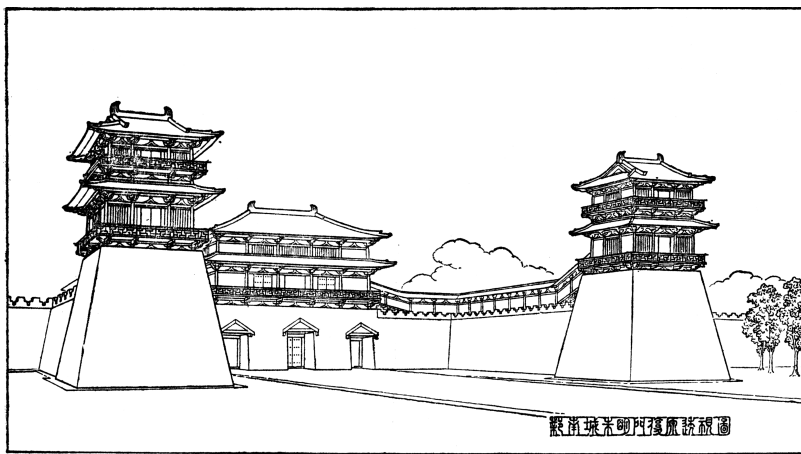


图1 邺南城朱明门遗址复原图

图片来源：郭义孚：《邺南城朱明门复原研究》，载《考古》，1996（1）。

①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上篇《西京》“六、长安城门交通制度”，12-14页，三秦出版社，1991；韩建华：《中国古代城阙的考古学观察》，载《中原文物》，2005（1）；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载《考古学报》，2015（4）；徐龙国、徐建委：《汉长安城布局的形成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写定》，载《文物》，2017（10）。

② 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载《考古学报》，2015（4）。

③ 《洛阳伽蓝记》序记洛阳城门：“门有三道，所谓九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释》，32页，中华书局，2010）。

④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载《华夏考古》，2018（6）。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96（1）。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都城城门交通制度,学者们常征引《汉书·成帝纪》中的一段文献予以说明:“(成)帝为太子……初居桂宫,上(元帝)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①。应劭注:“驰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②此外还有《太平御览》引陆机《洛阳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此三道四通五达也。”^③这两段文献反映出都城三门道门址的特殊性,中央门道与两侧门道在交通流线上也有所区别。

三、隋唐时期都城与地方城市的城门

隋唐时期都城遗址反映出的都城城门规划,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大兴唐长安城(下简称“隋唐长安城”)是一座经过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是隋唐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明德门是长安城外城的正南门,处在全城中轴线上,考古发掘证实明德门为五门道(图2),近年对明德门的补充发掘证实,自该门址营建的第一期起即为五门道的门址,据此可初步推定五门道的规划应始自隋建大兴城太阳门。^④傅熹年对明德门进行了复原探讨,认为门楼应为十一开间,是当时最高等级的殿堂建筑,也可以说明明德门的重要性。^⑤隋唐长安城外郭城门除明德门外有六座经过考古勘察或发掘,均为三门道。^⑥大明宫正门丹凤门也经过考古发掘,可以确知也是一座五门道的门址。^⑦结合长安城郭城正门明德门和大明宫正门丹凤门均为五门道,似乎可以推测这是都城正南门特有的制度,以示与其他城门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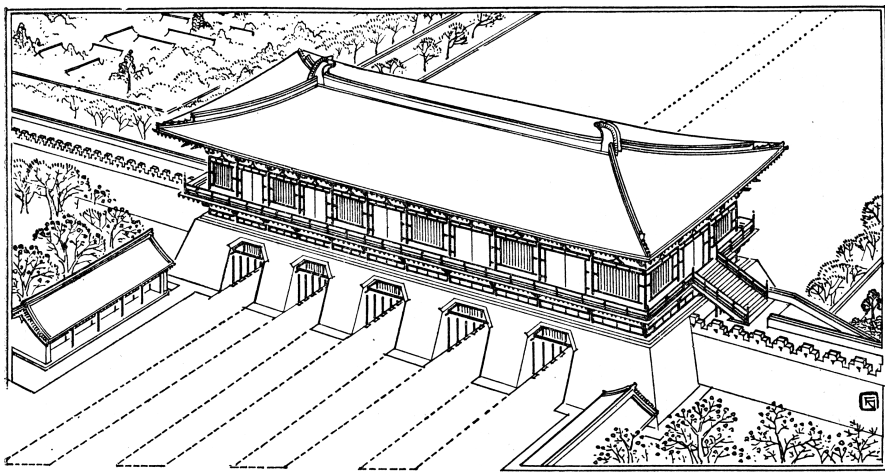


图2 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复原图

图片来源: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载《考古》,1977(6)。

隋唐洛阳城为东都,外郭城南墙正门定鼎门和宫城南门应天门均已经过考古发掘,发掘证实,二门均为三门道。其他已经过发掘的郭城门址长夏门、永通门及皇城右掖门、东城宣仁门,经过勘

①② 班固:《汉书》卷10,301、302页,中华书局,1962。

③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95,941页(下栏),中华书局,1960。

④ 龚国强:《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载《华夏考古》,2018(6)。

⑤ 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载《考古》,1977(6)。

⑥ 其中东墙中部的春明门由三门道改建为单门道,有学者认为或与兴庆宫的改建相关。参见龚国强:《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载《华夏考古》,2018(6)。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6(7)。

察的郭城门址厚载门、建春门及宫城应天门均为三门道，由此可知隋唐洛阳城郭城、皇城、宫城的主要城门，应均为三门道形制。^① 其中，应天门为宫城正门，自隋代始建时即前出双阙，唐宋遗迹也表明皆为下列三门道的门址（图3）。洛阳北宋时期为西京，宫城正门再次重修，形成前出三出阙的双阙、下列三门道规模宏大的过梁式门址。^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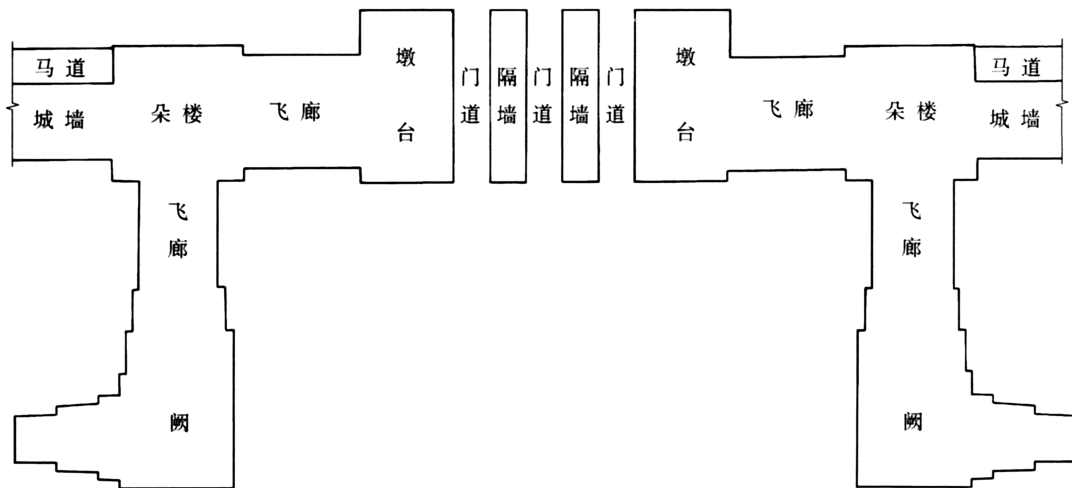


图3 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平面复原图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400页，文物出版社，2014。

唐代地方城市的城门规制与都城有所不同。符载《新广双城门颂》^③ 记贞元十四年（798年）对钟陵城内进行改建工程，“自我官府，至于门台”，并因旧子城门“崇未及雉，广不容轨”而进行改建，改建后“岩岩四扉，每五夜将旦，候吏云委，鼓鸣逢逢，輶然洞开”“严城朝旦日曈曈，高开四门车马通”。其中，“岩岩四扉”“高开四门”可与“双城门”相应，确认改建后的城门是一座有两个门道、共四扇门扉的城门。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记大中十四年（860年）楚州修内城南门，改建之前的城门“卑且陋，但阖两扉”，改建后，“巍然而楼，增以旧五之二焉，划为双门，出者由左，入者由右”。^④ 由此可以知道，改建工程是将单门道的子城南门改建为双门道，两门道还有交通规划的不同。^⑤ 更值得注意的是，郑吉对改建南门缘由的叙述：“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门。何以言新？因旧之云也。何以言作？更从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诸侯台门也。何称内城？别于外郭也。春秋传曰：南门者，法门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⑥。说明唐代地方城市中尤重子城南门，一方面是内城与外城相区别，即内城别于外郭；一方面是地方城与都城相区别，即所谓“天子诸侯台门”。

傅熹年即据上引文献材料，结合敦煌壁画中的城门形象，提出唐代都城、宫城正南门开五门道，其余城门开三门道；盛唐以后府州城的子城正门因为一方政令所出，特别崇重，因此开双门

① 石自社：《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的观察》，载《华夏考古》，2018（6）。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五章第二节之“一、应天门的钻探与发掘”，376—400页，文物出版社，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宫城核心区南部2010—2011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19（1）。

③ 董浩等：《全唐文》卷688，7043页，中华书局，1983。

④⑥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812，4288—4290页，中华书局，1966。

⑤ 辛德勇较早注意到《楚州修城南门记》中对城门交通规划的记述，并征引此文用以说明唐长安城外城门址门道的交通规划问题。参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上篇《西京》“六、长安城门交通制度”，12—14页，三秦出版社，1991。

道；一般城市的城门只开单门道。^①

要之，至隋唐时期不同城市的城门规制已可看出清晰的差别。宿白曾在《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一文中根据城址的规模和布局，将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占地十六坊的大型府州城、占地四坊的一般府州城和占地约为一坊的小型州城与县城五个类型，其中京城特指长安，都城则指洛阳等城，特别指出洛阳在城址平面布局上是次京城长安一等的都城级别。^② 宿白所揭示的隋唐城址等级，在城门的规制上也有清晰的体现，京城（长安）、都城（洛阳、扬州）、府州城及其他一般城市的城门规制在宫城或子城正门上体现最为明确，分别为五门道、三门道、双门道、单门道。可以说，到隋唐时期城门址所体现的等级和礼制差异已十分明晰。从这一点上与其他考古材料如墓葬等所看到的历史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四、两宋时期都城与地方城市城门的营建与改建

沿至两宋时期，由于资料更加丰富，我们对于城门制度的认识也更加立体。其中，北宋东京的城门营建与改建颇具代表性。

北宋东京诸城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宫城正门宣德门。宣德门虽未经考古发掘，但文献与图像资料较为丰富，早为学者重视。傅熹年即指出赵佶款《瑞鹤图》与辽宁博物馆藏北宋钟上浮雕图像中所表现的宣德门（图4）系单檐庑殿顶城楼，两侧出朵楼，前出双阙，下列五门道，是北宋晚期蔡京主持改建的结果。此次改建前的宣德门下列三门道前出双阙，是北宋初年在唐代汴州子城正门基础上改建而来。^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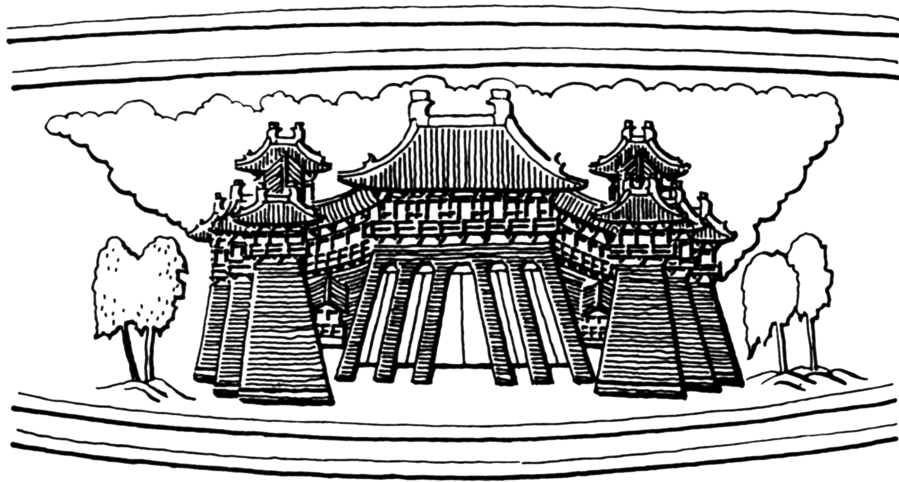


图4 辽宁博物馆所藏北宋铜钟上的城门浮雕图案

图片来源：傅熹年：《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傅熹年卷》，121页，故宫出版社，2014。

按傅熹年此说甚是。北宋初改建后的城门成寻曾予实录，《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四记：“（熙宁五年十月廿四日）过数里，见皇城南门宣德之门，七间门楼门也。左右有二楼，各重重五尺

①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三章第一节之“二、隋唐时期的地方城市”，354-355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②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279-285页，文物出版社，1990。

③ 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载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51-56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

许，高颇下，内面左右楼廊造列，外面有左右会，如日本朱雀门，是南面东第一门也”^①。徽宗朝改建后的宣德门，《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记之甚详：“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②。

在宣德门历次改建工程中，傅熹年即已注意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增建双阙、改建门道数。傅氏征引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载宣德门改建尤其值得注意，兹重录如下：

先君言：宣德门本汴州鼓角门，至梁建都，谓之建国门。历五代，制度极库陋，至祖宗时，始增大之，然亦不过三门而已。蔡京本无学术，辄曰：“天子五门，今三门，非古也。”天子五门，谓皋、库、雉、应、路，盖以重数，非横列五门。京徐亦知其误，而役已大兴，未知所出。其客或谓之曰：“李华赋云：‘复道双回，凤门五开。’是唐亦为五门。”京大喜，因得以借口，穷极土木之工，改门名曰太极楼。或谓太极非美名，乃复曰宣德门，而改宣德郎为宣教郎。门成，王履道草诏，曰：“阁道穹窿，两观蹇翔于霄汉；阙庭神丽，十扉开辟于阴阳。”十扉，谓五门也。昔三门，惟乘舆自中门出入，若赐臣下旌节，则亦启中门而出，盖异礼也。至是，中门之左右二门，亦常扃鐍。赐文臣旌节，则启左而出；赐武臣旌节，则启右而出。门虽极精丽，然气象乃更不及昔之宏壮也。^③

这条文献透露出的信息，除城门形制的变化外，还有宋人对于城门规制的观念。北宋立都开封，祖宗时因此改建城门，“增大”之后的结果是“不过三门而已”，即下列三个门道，说明之前的城门制度应该更减省。傅熹年曾据其对唐代地方城市的研究指出：宋初改建应是改二门道为三门道，并增建门楼两侧的朵楼和自朵楼向前伸出的阙^④，确实是有道理的。这反映出北宋初在宫城改建时对宫城南门形制的认识，双门道、无双阙与国都不合。而改建后的宫城南门，参酌前文引述成寻记载，与前述洛阳应天门颇为类似。《宋史·地理一》记：“建隆三年……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以修之。”^⑤ 以往学者多从东京宫殿布局模仿洛阳理解，按上文分析，宋初宫城营建工程中城门制度应是“按图修之”的重要内容。

至北宋末，将宫城南门改建为五门道。据陆游《家世旧闻》所述，这是因为蔡京对“天子五门”的错误理解，危机的化解源于对唐长安大明宫丹凤门五门道形象的“借用”^⑥，成为改建宣德门五门道的合理性依据。改建之后，门道的交通制度也因此有所变化，以往三门道中仅中央一个门道日常关闭，改建为五门道后，则中央三个门道日常关闭，当心门道供皇帝出入，其次的两个门道供重要仪式活动时使用，仅最外两个门道日常使用，其使用方式也与唐代长安城进一步趋同。^⑦ 按除《家世旧闻》所引诗文之外，宋人对唐代都城的效仿，恐亦可能源自吕大防《长安图》或类似长

① 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329-3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30页，中华书局，1982。

③ 姚宽、陆游撰：《西溪丛语 家世旧闻》，219-220页，中华书局，1993。

④ 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载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51-56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

⑤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记载与此相似：“国朝建隆三年五月诏广城，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以修之”，参见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5册，9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傅熹年即已据此推定北宋初宣德门改建在此时，见前引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载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51-56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

⑥ 《家世旧闻》记蔡京改建宣德门五门道，以李华赋“复道双回，凤门五开”为借口。按此处当为误记，李庾《两都赋》记大明宫“龙道双回，凤门五开”，参见吴春等主编：《唐大明宫史料汇编》，422页，文物出版社，2012。李华《含元殿赋》文作“其南则丹凤启涂，遐瞩荆吴，十扇开闭，阴阳睢盱”，参见吴春等主编：《唐大明宫史料汇编》，417页，文物出版社，2012。

⑦ 唐长安城明德门的交通制度参前引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上篇《西京》“六、长安城门交通制度”，12-14页，三秦出版社，1991。

安城图。元丰间吕大防知永兴军，与吕大临、刘景阳等共同刊刻了《长安图》，并行的还有太极、大明、兴庆三宫图。后两宫图原石今残，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中兴庆宫基本完整，大明宫保存了南侧局部，丹凤门居于宫城南墙中部，五门道作法刻画清晰（图5）。^①《云麓漫钞》记：“长安图，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汲郡吕公大防，命户曹刘景阳按视、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大率以旧图及韦述《西京记》为本，参以诸书及遗迹。”^②由此知《长安图》与太极、大明、兴庆三宫图尚参考了“旧图”，是吕图刊刻前已有其他长安图流传。而随着元丰三年吕图的刊刻和成书于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宋敏求《长安志》的流传^③，隋唐长安城形制势必进一步为宋人所熟悉。与宋初改建工程主要参考洛阳宫城不同，蔡京改建宣德门五门道工程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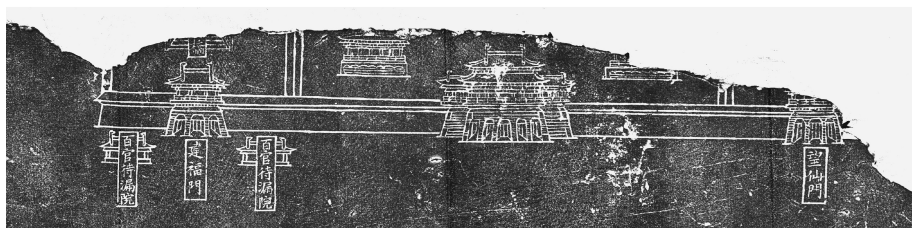


图5 吕刻大明宫图拓本局部

图片来源：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1卷，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东京宫城正门的改建工程可以看出汴梁城从唐代地方城变为宋代都城，历经历了从双门道到宋初三门道并加建双阙，再到北宋末改建五门道的历程。从城门建筑的角度而言，双阙的有无是外观最显著的特点，自不待言。而从双门道改建为三门道、五门道，则突出了中央门道的重要性，中央的门道仅供皇帝出入，日常关闭，只有两侧的门道日常使用，这是所有进出或看到城门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其“礼仪性”同样不言而喻。进一步说，北宋东京宫城正门改建工程所模仿的对象，也从隋唐洛阳转变为隋唐长安，是中国古代都城城门制度发展见证的极佳标本。

开封城由于地处黄泛区，宋城遗址深埋地下，考古工作开展不易。目前，已经经过考古发掘的门址为顺天门（新郑门）遗址。顺天门是东京外城东西主要干道上的门址，地位比较重要。考古工作者认为：顺天门门址由瓮城、城壕组成，瓮城方形，瓮城门与主城门相对；已发掘揭露出为一座三门道门址，为宋代遗迹；三门门址下勘探出一座单门道门址，为五代遗迹（图6）。^④如果此说不误，则北宋外城也经历了一次从单门道门址改建为三门道门址的过程，结合隋唐都城外城城门也均作三门道来考虑，这次改建当与北宋前期对宫城南门从双门道改为三门道相似，反映了北宋对都城外城城门规制的认识。

可与北宋东京对比的材料，还有辽代都城。辽上京神册三年（918年）建城，名皇都；天显元年（926年）展郭郭、建宫室（天赞宫），起三大殿（开皇、安德、五鸾）；天显十三年（938年，

① 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1卷，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赵彦卫：《云麓漫钞》，140页，中华书局，1996。

③ 《长安志》版本及吕图流传问题，请参见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载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304-341页，中华书局，1996。

④ 勘探、发掘简报中尚未完整刊布发掘资料，已刊布的遗迹、遗物年代似仍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值得进一步关注。请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2012—2017年勘探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20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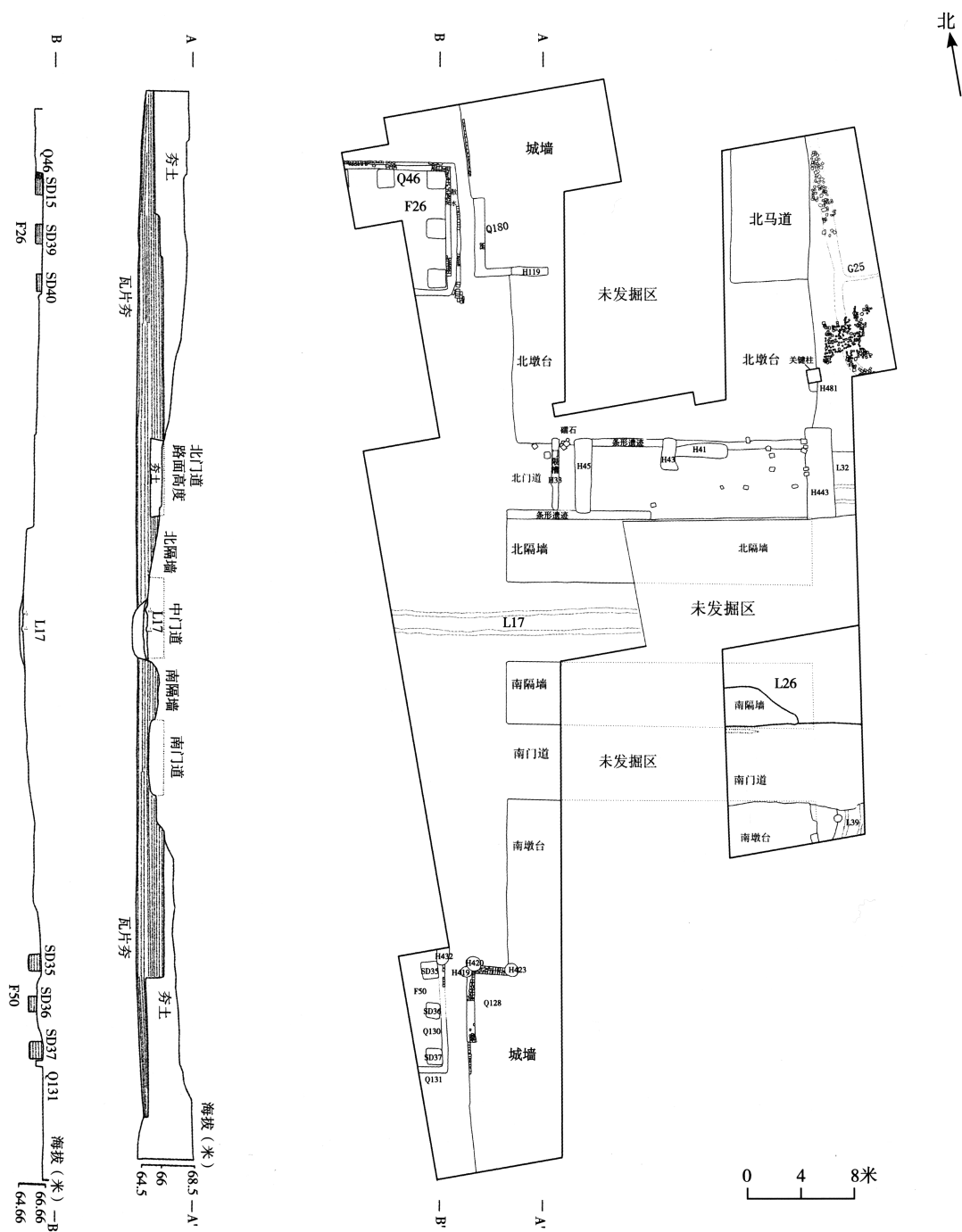


图6 北宋东京顺天门主城门遗址平剖面图

图片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 2012～2017 年勘探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2019（1）。

亦即会同元年）辽太宗更名上京临潢府。^① 辽上京平面呈“日”字形，北城是皇城，南城是汉城。近年来辽上京皇城的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进展，皇城西门、东门陆续做了考古发掘（图7）。皇城西

^① 脱脱等：《辽史》卷37，496-499页，中华书局，2016。

门辽金沿用，是一座单门道的过梁式门址。^① 皇城东门是一座三门道的过梁式城门，金代以后封堵了南北两侧门道，继续使用中门道。辽上京宫城近年来也通过勘探和发掘明确了形制和规模，东、南、西三门均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西门（西华门）、南门（承天门）^② 也都是单门道的过梁式城门，尤其特殊的是宫城东门（东华门）^③，是一座坐西朝东面阔七间的殿堂式门址，从保留的遗迹推测当心间和两侧稍间外有慢道，即共有三间作为出入通行门道。由此，辽上京的发掘者把辽上京皇城和宫城门址进行了分类如下表。^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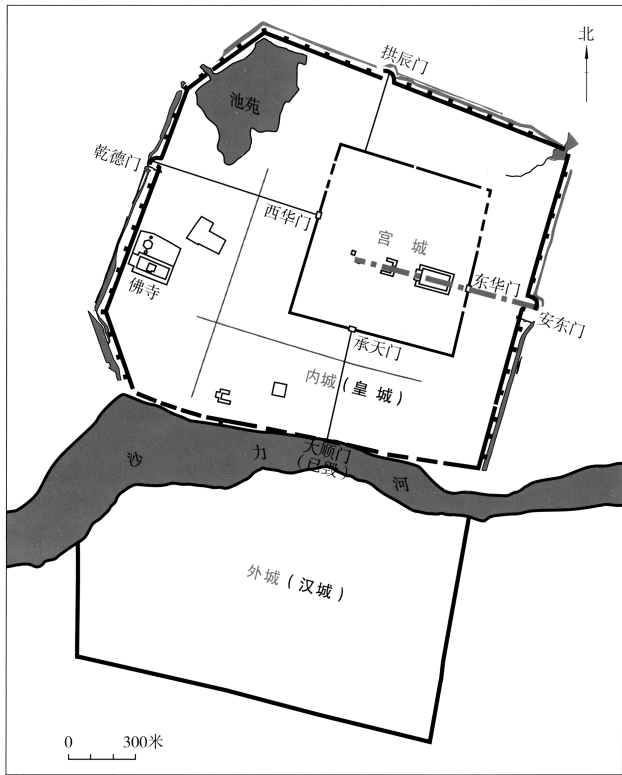


图7 辽上京平面图

图片来源：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载《考古》，2019（5）。

辽上京皇城、宫城门址分类表		
表	过梁式城门	殿堂式城门
三门道	皇城东门	宫城东门
单门道	皇城西门、宫城西门、宫城南门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辽上京皇城、宫城中特重东门，这和契丹民族以东向为尊有关。^⑤ 皇

① 董新林等：《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12-01-20。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2019（5）。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2017（6）。
④ 汪盈、董新林：《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载《华夏考古》，2018（6）。
⑤ 董新林已据考古发现提出，辽上京以东向为尊，存在一条东向轴线，参见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载《考古》，2019（5）。

城东门为排叉柱过梁式城门，并采用三门道，与皇城西门有别，显示出等级较高。^① 宫城东门虽然采用殿堂式，但也特别使用三门道，与西门、南门判然有别，显然也是有意为之。

辽中京建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史》记：“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郭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郭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路振出使契丹时所著《乘轺录》中记载了刚刚建成的辽中京的实况：“契丹国外城高丈余步……南门曰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夏门入……三里至第二重城门，城南门曰阳德门，凡三间（门），有楼阁，城高三丈……自阳德门入，一里而至内门，内（曰）闾阖门凡三门，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闾阖门楼有五凤，状如京师，大约制度卑陋。东西掖门去闾阖门各三百余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③

辽中京已经考古勘察，由外城、内城、宫城重城相套，宫城居于北部中央。学界普遍认为中京城市布局与上京不同，主要模仿中原都城制度。^④ 路振行记记载了出使时所见中京诸门，似可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中京外城南门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应是指下列三门道；内城南门阳德门，原文作“凡三间”，参酌上下文应为“凡三门”之误，指的也是下列三门道；宫城正门闾阖门同样也是“凡三门”，下列三个门道。路振特别指出“闾阖门楼有五凤”，说明辽中京宫城正门也是一座下列三个门道、前出双阙、上建城楼的城门，正与前文所论北宋初改建后的东京宫城正门相似，所以路振说闾阖门“状如京师”，只不过“大约制度卑陋”；进一步结合中京中轴线上外城、内城、宫城南门均作三门道，应与城市布局相似，来源于中原制度。《辽史》云中京“拟神都之制”，陈述即认为“神都”是指洛阳，由此辽中京城门与北宋东京城门形制相似就是可以理解的了。^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辽中京营建工程工匠来源于燕、蓟，也与上京有所不同，应与其模仿中原制度也有关联。^⑥

宋人对于城门制度的观念，还可从东京以外的诸京及地方城市两方面入手加以分析，其中南京文献记载较详，也颇具代表性。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⑦，以子城为宫城，真宗登府署正门，后称“重熙颁庆楼”。此后，宋臣屡有改建南京宫城的建议，特别集中在宫城南门重熙颁庆门与正殿归德殿。

夏竦景祐年间知南京，《乞修南京大内状》记载了其出任南京时的情况，并建议改建重熙颁庆门：“其正南内门上，有先朝题其榜曰：‘重熙颁庆之门’。楼皆损动，其下只是依旧双门，未变列郡之制。虽有两观雉堞，又无朵楼。内城之中并无‘归德’之殿，但是颓垣茂草……欲乞于南端辟正门三闾，东西增朵楼二座”。特别说明是因为“又以宫室之仪，门闾为重，犹取诸侯之制，未成王者之都”^⑧。

① 可对比辽祖陵黑龙门，经考古发掘确认也是一处三门道的排叉柱过梁式城门。祖陵营建与上京营建前后相继，或可反映出当时的规划思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18（3）。帝陵規制问题已超出本文主题，容另文研讨。

② 脱脱等：《辽史》卷39，545—546页，中华书局，2016。

③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中疏证稿》，60—61页，中华书局，2004。

④ 徐苹芳：《宋辽金元明时代考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439—448页，文物出版社，1999。

⑤ 脱脱等撰，陈述补注：《辽史补注》卷39，1656页，中华书局，2018。

⑥ 以往学术界讨论辽代建筑，多笼统概述以“辽承唐制”，这一看法仍待进一步辨析。特别以城市及城内重要建筑的营建而言，辽上京营建似较多地受到了渤海的影响，近年考古发掘已初步证实。此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容另文研讨。

⑦ 《宋史》卷85记：“南京。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原注：元丰六年，赐度僧牒修外城门及西桥等。）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参见脱脱等：《宋史》卷85，2104页，中华书局，1977。

⑧ 解缙等：《永乐大典》卷7701，3566页，中华书局，1986。

张方平《奏请修南京内殿门阙事》记其重修重熙颁庆门内前正街祥辉门、崇礼门事，并建议改建重熙颁庆门：“重熙颁庆门见是两门，未改列郡之制，楼观卑陋，任复倾摧。内城中惟有真宗皇帝御诗碑亭两座，外更无片瓦，尽是榛芜”^①。着眼点与夏竦类似，强调双门道是“列郡”之制，与南京地位不合，因此“欲乞朝廷检会先朝所降指挥及王曾等擘画事节，特令指挥改修重熙颁庆正门。依北京内门营造，并创建归德一殿及殿门四面行廊，约不过百余间”^②。

张方平在《乞量修南京旧内事奏》重申改建南京宫城正门为三门道的请求：“臣伏以应天府王业所基，开国之本，自建为南京，以府廨为内，至于宫殿门阙，各已立名。其旧屋舍尽拆移修盖为今府廨，宫城之内，鞠为场圃，惟有门楼，常经真宗皇帝登御，赐名曰重熙颁庆之门，依旧只是州衙旧门，制度卑陋，自后不曾营缮。前后知府王曾、夏竦、韩亿及臣，累曾奏乞量修一殿及门阙，共盖屋五十余间，即可粗立基构。朝廷以为不急，因循至今……伏乞朝廷特就将作监差官一员，将带作匠三两人到本府检计改作三门，修建粗成门阙规制。”^③

苏颂《奏乞增修南京大内》再次要求改建南京宫城，所记前后经过更详，不憚其繁，摘引如下：

臣伏以南京国之东门……自建都迄今六十余年，人物风流，一时甚盛，而宫殿城阙都未修崇。惟大内正门以真宗皇帝车驾巡幸，曾驻蹕于此，肆赦观酺，因赐名重熙颁庆楼。当时虽稍完饰，然犹是双门，不改列郡之制。内中只有御制诗碑亭子二座外，更无屋宇。俱是榛芜，非所以尊艺祖肇基之邦，慰都人僊望之志也。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建京制曰：可升应天府为南京。正殿以归德为名，即以牙城为大内。寻降图修造，事虽颁下，即未施行。天禧中，知府王曾相度减省舍屋，别具图进呈，乞行营建。景祐中，知府夏竦、韩亿相继奏请，乞改内前正卫中隔城祥辉门及正南外城崇礼等门，皆作三门。适值岁时不稔，并以陕西事宜未暇及此，然亦逐次降朝旨，令候丰熟日奏取指挥。嘉祐中，知府张方平亦曾经画得旨，只是修葺过祥辉、崇礼二门，余尚仍旧。臣近叨守钥，目睹其事。阙门摧侧，栋宇堕颓。盖由守臣失于检举。欲望圣慈颁命有司，令讨寻王曾等所奏，再行相度，酌中制度。修盖归德一殿并前后门四面轩廊，仍改正门为三门，大约不过一百余间。度其所费，亦不甚多……先且修盖内门，令稍合阙庭制度。候工毕日，渐次经营崇建殿宇等。二三年间，便可就绪。庶几兴王旧都，稍为壮丽。近圻别钥，得以尊严。表式四方，事体诚重。^④

从上述夏竦、张方平、苏颂奏议可以看出，南京宫城以应天府子城改建而来，宋臣要求改建宫城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宫室之仪，门阙为重”，而南京宫城正门“犹取诸侯之制，未成王者之都”，具体而言即“犹是双门，不改列郡之制”，并且无朵楼。因此，宋臣屡有改建之议，具体方案可以夏竦“辟正门三闕，东西增朵楼二座”概括，从而使“兴王旧都，稍为壮丽”。可以看出宋人观念中“双门”还是“三门”、有无朵楼、阙楼是“国都”与“列郡”的重要区别。南京既已从“列郡”等级的应天府升为“国都”南京，宫城正门的形制就应当随之调整、改建，按照苏颂的说法即宫城正门的形制事关“阙庭制度”“表式四方，事体诚重”。

北宋西京沿用自唐代应天门，下设三门道、前出双阙，文献称“五凤楼”，其形制对北宋初改建东京宫城正门产生直接影响，已如前述。张方平《奏请修南京内殿门阙事》建议改修重熙颁庆门时“依北京内门营造”，透露出北京宫城正门也应是下设三门道、前出双阙。由此可知下设三门道、前出双阙当为宋人观念中北宋诸京宫城正门的通制，也就是“国都”宫城正门所应具备的形制。

①②③ 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5，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37叶b—第39叶a、第48叶b—第49叶a。

④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9《奏议》，260—261页，中华书局，1988。此条文献呈季宇博士提示，谨致谢意！南京修城事，亦见于叶梦得：《石林燕语》，16—17页，中华书局，1984。

这一观念，还反映在南渡之初对宫室改建的奏议中，叶梦得《宫室议》云：“今陛下既以建康为别都，则视周洛邑与汴京……端门亦当增为三门，以正天子之礼”^①。又在《奏营葺行宫制度画一札子》中申说更为细致：“臣遵奉圣训，先次草具到营葺行宫图二本并《宫室议》一篇缴进。所有图内参考古制，所当增添殿宇官府事理，并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数目，及宫城外门制度，合详具奏禀，今具画一开陈下项：一、《周官》：王国皆旁为三门，此天子之制也。盖五门皆取正中一门名之，其旁又为两门，通为三门。至雉门为王宫之门，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则又有象魏设于门之左右，谓之两观，亦或谓之阙。诸侯则不得备三门，而无两观，故独鲁以周公之赐得有两观，则新作南门与新作雉门及两观，见书于《春秋》。今行宫但因建康府旧制为两门，其上增展门屋九间而已，此诸侯之制也，恐非典礼。今打量旧城两门各阔一丈七尺，其两间相去有地步六丈，若于中间就开一门，即不须改作，可就立三门。门前东西仗舍各有地步，可以增设两观。”^②

叶梦得对“王国皆旁为三门”“天子五门”的理解或有未谙，但明确提出“诸侯则不得备三门，而无两观”。叶梦得对建康宫城城门的改建建议十分细致，认为宫城正门“因建康府旧制为两门”，是“诸侯之制”“恐非典礼”，并仔细丈量了两个门道的间距为六丈，而每个门道宽一丈七尺，因此完全有条件在不做大的改动的前提下新开一个门道以满足三门道的配置。这一观念，正与夏竦、张方平、苏颂等人对改建南京宫城正门的提议一脉相承。

地方城市中，广州子城正门的修建具有代表性。大德《南海志》卷八记：“双门，榜清海军。元符间柯经略述建，规模视广右尤壮……淳祐四年，经略方宝学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今扁广东道。”^③此门元明清屡有重建，后改称拱北楼，至民国被拆毁开路，所处之地俗称“双门底”，至晚清民国时此名仍流行。^④淳祐改建事，刘克庄《广州重建清海军双门记》记之甚详：“清海军门始建于绍兴丙子，折公彦质也；改作于淳祐甲辰，方公大琮也。筑基广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虚其东西二间为双门，而楼其上者七间。凡基皆甃以石，覆以砖。门之柱八，各三丈六尺，旁柱三十有六……辟两旁地为两翅，环以翅楼，前为颁春、宣诏二亭……而是门之役最巨，视福、泉、建安加壮丽焉”^⑤。据“虚其东西为双门”及门用“柱”“旁柱”可知，方大琮改建后的双门，系下列两个门道的排叉柱过梁式城门，门前出翅楼，城门上更建七开间城楼，规格极高。2002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北京路步行街发掘出自宋至清叠压的建筑基址和自唐至今叠压的道路遗迹，发掘者将宋代建筑基址推测为双门的西门洞遗迹。^⑥

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志》记改建之事系方大琮“授匠以式”。方大琮就改建事与刘克庄有信件往还，自述原委，云：“清海军双门为广府门面，始创者谁，绍兴丙子折枢帅彦质葺复，乾道戊子龚参帅实之新其牌，顾所以坏者虚其址，如人家架楼然。某初姑令撑拄，后必有作者。颠不扶犹可，侨将压奈何？补苴无益，不若扫地以求更新，筑成实址，为楼为门，又于其前作两翅屋其上，规模视前为壮实，而翅楼又前所未有”^⑦。按方大琮所言，改建双门道似可追溯至绍兴二十六年

①②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10，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74册，445、4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③ 王晓波、李勇先、张宝见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8册，7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南宋人方信孺撰《南海百咏》（宛委别藏丛书本，第3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记“清海军楼，元符二年柯公述所创，折公彦质重建于绍兴二十年，近岁又一再作新矣”。

④ 参见黄佛颐：《广州城坊志》，110-12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⑤ 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90，3815-3816页，中华书局，2011。

⑥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的发掘》，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182-201页，文物出版社，2005；朱海仁：《广州千年古楼遗迹考略》，载《岭南文史》，2004（2）。

⑦ 《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16《与刘潜夫克庄书》，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宋别集类影印明正德八年刻本第89册，49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又，清代地方文献多认为唐末或南汉削番、禺二山之交，叠石建双阙其上，可参前引朱海仁：《广州千年古楼遗迹考略》，载《岭南文史》，2004（2）。如以淳祐改建方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并自述“翅楼又前所未有”审之，则双门前出翅楼疑始自淳祐改建。明清之说，似不宜轻信。

(1156年),淳祐四年(1244年)改建工程的城门形制则出于方大琮,其中最大的改变是加建翅楼。而改建高规格的城门、城楼,是因为“清海军双门为广府门面”。刘克庄在方大琮墓志中也评价说“改创清海军门楼,巨丽为诸道冠”^①。

除广州以外,两宋时期有不少府州城子城正门为双门的记载,兹举两例。^②如《永乐大典》引开庆《临汀志》记汀州:“郡城,唐大历四年,刺史陈剑移筑笼山瞰溪。大中初,刺史刘岐始创敌楼一百七十九间……子城,唐刘岐创筑,宋朝治平间修缮……宣和间,郡守潘公辟重建双门,架雉楼其上。”^③“雉楼,在子城双门上。旧卑隘弗称,绍定间郡守李公华增高辟广,翼以舞凤,一新缔创,规置伟壮。”^④淳熙《三山志》卷四“子城”条记:“南虎节门。(原注:双门。祥符九年,严侍御辟疆新而名之。嘉祐四年,元给事绛重作。熙宁二年修。政和六年,黄尚书裳重修。)”^⑤同书卷七“府治”条记:“威武军门,本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元锡所建州门也。乾宁三年,州升为威武军,遂为威武军门……嘉祐八年,元给事绛更为双门,上建楼九间。”^⑥上举二例也说明宋代对宋人观念中类比“列郡”的府州城市子城正门的改建工程,具有较强的共性。

这一制度对宋以后的都城建设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在辽南京基础上改建金中都,贞元元年(1153年)金中都新宫建成,其城门形制文献记载较为细致,如外城南门丰宜门、皇城南门宣阳门皆上建九间城楼、下设三门道,而宫城正门应天门则上建十一间城楼、下列五门道,前出双阙。^⑦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也采五门道、前出双阙的形式。^⑧这一城门制度也又为明清所继承,今天北京故宫正门午门“五凤楼”即此形式的余绪,午门城楼下正面列三个门道,两侧各开两个掖门,共计也是五门。^⑨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都城城门至汉代已确立采用三门道的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出现了进一步发展,京城(长安)、都城(洛阳、扬州)、府州城及其他一般城市的城门规制在宫城或子城正门分别为五门道、三门道、双门道、单门道。这一情况对两宋时期及以后的都城及地方城址也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北宋诸京和广州等地方城市的分析,可知在宋人的观念中,京城外城、宫城城门均应为三门道,而府州子城正门则应为双门道。这一差别反映的正是宋人观念中“国都”与“列郡”的区别,也就是不同的城市在城门等级上的区别,充分体现出城门作为城市重要构成要素所具有的礼仪性。

北宋《天圣令·营缮令》记:“太庙及宫殿皆四阿,施鸱尾,社门、观、寺、神祠亦如之。其宫内及京城诸门、外州正牙门等,并施鸱尾。自外不合。”^⑩可以施用鸱尾的城门,正集中在前文分析的可以采用三门道、双门道的城门中,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一方面说明时人观念中这些城门最

① 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151“铁庵方阁学”,5966页,中华书局,2011。

②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所记“双门”,除特指双门道的城门以外,有些是指两个城门,有些则是两个门扇,在讨论时应注意甄别。

③ 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册,1209页,中华书局,2004。汀州城概况,请参见王子奇:《福建汀州城址勘察》,载《中原文物》,2014(2)。

④ 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册,1304页,中华书局,2004。

⑤⑥ 王晓波、李勇先、张宝见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5册,82、17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⑦ 金中都城门形制,楼钥《北行日记》、范成大《揽辔录》记之甚详,二人使金行记当为实录。请参见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378-379、395-396页,商务印书馆,2017。又文献记载金中都建设模仿北宋都城“按图修之”,当为其渊源所在。金、元以后都城城门营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阐述,容另文研讨。

⑧ 傅嘉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载《考古学报》,1993(1)。

⑨ 吴庆洲:《宫阙、城阙及五凤楼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下)》,载《古建园林技术》,2007(1)。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下册,421页,中华书局,2006。

为重要，也从侧面说明古代建筑等级制度包含内容的丰富性。

进一步说，前举东京北宋初宫城正门改建工程和诸臣对南京宫城正门改建之议的例子，揭示出宋人观念中列郡、国都的城门有所区别。以往包伟民曾指出宋代京城、区域中心城市、州县城市的人口在宋人笔下呈现出百万户、十万户、万户、千家市的“人口意向”。^① 前文所述宋人观念中“列郡”“国都”所应采用的城门制度，也与此相类似。以往已有学者试图从观念、习俗、礼仪、制度的角度分析墓葬材料，探讨其复杂的互动过程。^② 但与更易受到观念、制度等因素影响的墓葬不同，观念、制度等因素对城市营建尽管也十分重要，实际所发挥的效果却有很多局限。这是因为城市规模大、沿用时间长，且营建工程所耗财物及人力都远较一般墓葬或遗物大，因此，除非新建城市或城市内部大规模进行改建工程，否则城市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也正因此，文献中所记的观念、制度等因素在城市营建中的体现，仍需要通过新建、改建工程等例子进行细致地分析，而不能仅凭文献记载加以笼统地理解，本文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进行的尝试。^③ 在这一尝试过程中如何能将遗迹、文本、图像等各种资料有效地衔接起来，而不是就遗迹说遗迹、就文献谈文献。这也是本文希望能够探索的方面——在扩展研究资料的同时，也尽可能打破学科的限制。限于学力，认识难免表面，仍乞方家批评。

From Prefectural Center to Imperial Capital: The Institution of City Gates and Related Ideas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Tang and Song City Gates

WANG Ziq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city gates carried ritual significanc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gates of the capital cities Chang'an and Luoyang in the Han Dynasties were built with three doorways. Till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 system of constructing city gates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 more important the city was, the more doorways were constructed in its gate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gates of the capital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main gate of the palace city,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s of Luoyang and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ake, for example, the Song capital city Kaifeng. The southern gate of the palace city was reconstructed with three doorways and two gate tower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just like Luoyang. Then, following the institution of Chang'an, the gate was reconstructed with five doorways in the later period. This further influenced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itie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ity Gates; System of constructing city gates; Idea of constructing city gates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六章“人口意向”，304-323页，中华书局，2014。

② 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载《考古学报》，2006（1）；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载《考古学报》，2015（3）。

③ 从新建城址的角度对某一时代城址的特点展开分析，学界已有尝试，请参见杭侃、王子奇：《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市的考古学研究》，载《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31-362页，科学出版社，2014；刘未：《蒙元创建城市的形制与规划》，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313-342页，科学出版社，2015。